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Value Philosophy and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Shaochuan Cheng

Management School,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Email address:

sccheng@xjtu.edu.cn

To cite this article:

Shaochuan Che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Value Philosophy and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1, 2019, pp. 18-25.

Received: August 24, 2019; **Accepted:** September 20, 2019; **Published:** September 27, 2019

Abstract: The rational posi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been neglected by western philosophers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form has not been conclusive as evid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legality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been debated a lot. By comparing the categ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system, the research work puts forward the view of the source and basic for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has a philosophical construct that combines cognitive rationality with practical rationali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Zhou Yi, which was created 3000 years ago. This construction is the framework of practical rational philosophy that accepts cognitive rationality and carries out value judgment.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e analytical law of "value relationship" that transcends form, which constitutes the practical rational philosophy in which its academic position is above cognitive rationality. The study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Kant and his later western philosophy because of the choice of philosophical gene-category, and discusses the exploratory value space that the dialectical logic philosophy system of Chinese value form may bring to hermene,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worl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Form, Value Rationality, Practical Rationality, Formal Dialectical Logic

中国价值哲学的形成视角、学理地位及其学术意义的研究

程少川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西安, 中国

邮箱

sccheng@xjtu.edu.cn

摘要: 中国哲学的合理地位曾经长期被西方哲学家所忽视, 因为关于中国哲学形态的研究一直没有实际定论作为证据, 关于中国哲学这个提法的合法性问题也经历了很多争论。研究工作通过与西方哲学体系构建的范畴比较, 提出了中国哲学的来源和基本形态的看法, 指出中国哲学从3000年前创生的《周易》开始, 就拥有了将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合而为一的哲学建构, 这个建构是接纳认知理性并进行价值判断的实践理性哲学框架。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对超越于形态的“价值关系”的解析法则, 构成了其学理地位处于认知理性之上的实践理性哲学。研究指出了康德及其后来的西方哲学因为哲学基因——“范畴”的选择而产生的局限, 并初步探讨了中国价值形式辩证逻辑哲学体系对于诠释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世界文化沟通可能带来的探索价值空间。

关键词: 中国哲学, 哲学形态, 价值理性, 实践理性, 形式辩证逻辑

1. 引言

“中国哲学”这个称谓的合法性问题曾经被探讨了很久，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也有的学者从“爱智慧”的立场解释中国哲学，但总体上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观点去反驳西方哲学家所认为的中国仅仅存在哲学思想的判断[4,7]。回顾过去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学者提出关于中国哲学基本形态的定见。西方的哲学家中除了极个别的学者如莱布尼茨、荣格等对中国哲学独到的意义有所认识之外，少有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称谓持肯定态度。无论肯定或者否定，都需要站在一定的哲学立场，东西方哲学的源流及其立场实际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对于中国哲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普遍承认而言，历史上存在的一项关键不足是关于中国哲学的哲学形态没有得到确切的表述，那么关于中国哲学的意义及其学理地位，也就无法进行清晰的阐明。

中国哲学的发生源头极早，它来源于《周易》的判断原则，是周文王在殷代末期所创。它在表达和认知方面的难度，产生于它的目标指向是人类世界至今最难解决的哲学顶层问题之一，即价值判断的范畴选择问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及难度，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千年以来的东西方哲学家理论成果的总结中去觉察。尽管我们个人可能难以尽知所有学者的所有工作，但是只要通过哲学构建的一些关键因素去观察，就不难识别不同文化形态下的哲学构建立场及其成果形成领域。

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源流路径不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观察和实践立场，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各有精彩表现。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目前的哲学界狭义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偏极独大，有关价值抉择的相关理论被排斥在科学之外，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包括技术的滥用、学术与实践的脱节、由价值因素的选择性忽视所产生的评价理论体系的混乱等等。如要对此现状进行修正，也许需要不同的哲学观察视角和理论成果的加入。研究认为中国哲学或许是这种新的改变力量的来源。下文我们通过哲学源流观察及其主干的比较来识别中国哲学的形态、学理地位和学术意义，或许能够对目前的哲学发展状态予以某种程度的认识和改变。

2. 作为中国哲学之比较标的之西方哲学要点概览

从东西方哲学家们的努力来看，他们所称的哲学或者慧学，都是超越于经验而对于本质的探索。英国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样描述哲学家：“什么是哲学家？从字面上看这个词意指爱智者。但并不是每一个对知识有好奇心的人都是哲学家。哲学家是热爱洞见真理的人。一个艺术收藏家喜欢美的事物，但这并不使他成为哲学家。哲学家爱“美”本身。热爱“美”的事物的人是在梦中，而热爱“美”本身的人是清醒的[1]。”

苏格拉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创造了关于“理念”与“形式”的理论。在理解上，也许可以与中国哲学的“体”和“用”的组合相互对应。

苏格拉底有一个著名的洞穴譬喻，来帮助“理念论”（美本身）的理解：“那些不具备哲学思维的人就像洞穴中的囚犯，他们被铁链锁住，不能转身。在他们背后燃烧着一堆火，在他们前面有一堵空白的墙，把洞穴在后面隔断。在这堵墙上就如在屏幕上，他们看到自己的影子，以及它们与火之间的东西的影子。因为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他们认为影子是实在的事物。最后，有一个人摆脱了枷锁，而且摸索出洞口。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照耀在实在世界的真正事物之上的阳光。他返回洞穴把他的发现告诉他的囚犯同伴……但是在他们看来，他比逃出去以前更加愚蠢，因此要使他们信服是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对哲学是外行，那我们就像囚犯一样。我们只看到影子，即事物的现象。但是当我们成为哲学家时，我们就在理性和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而且这是真实的。（《西方的智慧》）”这种给予我们真理的光芒和认识的力量，代表“善的理念”。就这个立场而言，我们也不妨在中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观察中国文化中有怎样的“真理的光芒和认识的力量”。

东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为数众多，在此不能一一悉数。为了把握比较的要点，对于西方哲学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作为西方哲学集大成者的康德（1724-1804）的理论成果。要识别康德的哲学贡献，我们要从激发他进行哲学探索的怀疑主义者休莫（1711-1766）所提出的问题说起。

休莫的研究由他所说的“人的科学”所支配，他首先探索人类心智的范围和局限。从西方哲学传统的经验主义立场，休莫破除理性主义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观念，如果用佛教的说法是一种“无我”的观念。这与理性主义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在感觉经验中，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都是印象，没有一个印象能够产生人格同一性的观念”。理性主义者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本质的联系，强调这些关系是可知的[5]。但是休莫否认这种联系，确切地说，“即使存在这样的联系，我们无疑也绝不可能认识它们。”因为所经验到的都是一串串印象或者观念，所以考虑有或者没有其它更深的联系的问题，都是徒劳无益的。

最为根本的，休莫否定了具有一贯性和同一性的“自我”的存在。休莫开宗明义：“有些哲学家们认为我们每一刹那都亲切地意识到所谓我们的自我；认为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存在的连续性，并且超出证明的证据范围，确信它的完全同一性和简单性。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肯定的说法，都违反了可以用来为他辩护的任何经验，而且我们也并不照这里所说的方式具有任何自我观念，因为这个观念能从什么印象得来呢？”

再进一步，休莫甚至否定“世界可认知”这样一件事。“心灵是一种剧场，各种直觉连续不断地在这里露一下面。”“只有连续出现的知觉构成心灵，对于呈现这些背景的那个地方，或对于构成这个地方的种种材料，我们连一点概念也没有”。应该说从经验主义哲学的立场，休莫的逻辑表述十分完美而精确，罗素也感叹他的文笔“无可匹敌”。如果对于佛教的唯识理论有所认识，会发现他的观点与佛教唯识宗理论中法界唯识的观点有一点接近。但是休莫绝不是佛教唯识宗的观点，因为唯识宗

对于抽象的“关系”不仅有所归纳，而且也描述了它们的性质。具体可以参看《百法明门论》的“心不相应行法”部分的内容。

休谟的观点和严密的经验逻辑运用，对起初认为理性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康德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促使他探索“世界是否可认知”和“世界是否可改变”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康德的研究结果对近现代的西方哲学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康德并没有否认，即认为一切知识产生于经验。但是康德认为感官经验对于知识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知识的来源与知识的表达形式需要进行区分，那些把经验材料转化为知识的组织原则，并不是来源于感官经验。

康德在哲学研究上超越休谟的怀疑主义的核心进展，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在“范畴”方面的创造性工作的继承和发展。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把心灵提供的、用于将经验构造成知识的一些普遍性的理性概念称作“范畴”。他把原则上独立于经验的知识称为“先天的”（邓晓芒先生翻译为先验的，因为它们先于人的经验而存在），而来自经验的东西都叫“后天的”。因为存在超越于经验的先天因素，康德认为他找到了推演出完整范畴清单的根据与方法，即直觉判断。康德通过命题的传统形式特征，给出了用于涵盖知识的普遍性概念，也就是被他称之为先天（先验）概念的“范畴”表（康德，2004）：

量：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

质：肯定、否定、限定。

关系：实体与偶性、原因与结果、交互作用。

模态：可能与不可能、存在与非存在、必然与偶然。

康德指出，没有范畴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可沟通的经验。英国哲学家罗素对这个范畴表的评价是：“不难发现，康德的范畴表不像他想的那么完善，因为它依仗于略嫌狭窄的逻辑观点。但是，关于一般概念并非来自经验而又在经验领域中起作用的见解，仍然有重大哲学意义。”

那么什么是这张范畴表的“逻辑狭窄”之处呢？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居然没有时间概念。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先天的特殊概念，分属外感官和内感官的纯直觉。康德对时间和空间的讨论相当复杂，罗素认为其论证在总体上并非很有说服力。如果从后面我们介绍的中国哲学的立场来看，那些复杂的论证之所以复杂乃至缺乏说服力，是因为康德并没有找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表达方式。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文化实践理性哲学基因的优势所在。

康德的范畴为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性的哲学基础。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科学研究的对象的认知及其命题的建立，都需要用到这个先天范畴所规定的内容。它给认知设定了界限。这种认知界限的设定为现代“狭义科学”或者叫“实证科学”的定义提供了基础：科学是那些其命题可以证伪的领域的学问。这个狭义的和实证主义的科学仅仅属于认知理性，它可以是实践的条件和基础，但还不是实践理性。

康德在时间和空间关系安排上的困惑，使得他在实践理性方面实际上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康德不允许时间和空间的独立存在，但是怎样安排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这个困惑被放入了康德的无知黑箱“物自体”这么一个概念里，物自体在康德那里是不可知的。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沿用《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构建模式，实际上不可能有关于实践理性的成功的逻辑推导。因为实践理性是面对未来的价值选择，离开时间因素与空间的结合模式，价值判断则无从进行。好在康德有“良知”在，他直接运用内在的判断力提出了道德命令，成为后世伦理价值选择的一个重要标杆。

我们现在实证主义科学领域所采用的假设是时间与空间相互独立，实际上这种假设的有效性（而非正确性）是局限于特定领域和对象的。在逻辑上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因为如果时间和空间相互独立而不相关，那么所有的“预测”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与我们现实生活的事实不相吻合。所以康德不同意时间和空间的独立存在，他只是没有找到对应的“关系”表达方式。

价值属于关系范畴，这是百年以来对价值进行研究的一个定论。因为离开“关系”则没有价值可言。价值定义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界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与之对应的一个含糊概念还有“效用”一词。从定义到推理系统的缺失，使得价值认知的流派众多，各执一词。马克斯·韦伯曾直言“价值”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孤儿”，是导致社会学领域众多混乱的根源[13]。康德之后的西方哲学家们，包括孔德主张的科学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直到二十世纪罗尔斯的正义论的研究等等，由于同一哲学基因根源的特点，实际上都没有在康德面对的难题上获得实际的理论突破。落实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建构中的一项理论教条“事实价值二分法”，成为构建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哲学基石，由此也引来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奎因、库恩、普特南等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事实价值二分法”以及狭隘的实证主义科学体系提出了批判，其中普特南提出寻求解释“正确的道德之所以正确”[15]的哲学路径，这是西方哲学体系所缺失的。但因后现代主义学派并没有提出有效的理论体系来替代现有体系，因而他们的工作目前还未能撼动西方传统哲学体系的根基。

总的来说，西方哲学体系承接康德的哲学基因，其理论主要成功于认知理性的科学哲学领域，实践领域则以宗教文化为支撑构建价值体系，用信仰代替辩论，这样的双轨制事实上在某些时段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也在不断地削弱，出现了信仰危机。很多具有价值的传统道德观念正在被抛弃。自然科学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与社会科学领域价值认识的含糊以及弱化形成鲜明对比。目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被边缘化的情形日趋严重，有关价值抉择这一类具有对未来重要影响的研究，因为不具有实证主义的科学特征而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而无价值原则指导的科技成果应用所带来的环境危害、人类危机则层出不穷。人类或许到了应该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是值得的”问题的时候了。

3. 关于“价值”与“关系”的逻辑形态及其意义

价值属于关系范畴（王玉樑，2008），关系范畴却是一个难以被描述清楚的对象，因为这个概念所指的对象并没有形态。这正是基于经验逻辑的怀疑主义者休莫提出的重要疑点。对于这个范畴的归纳，康德只完成了用于认知的“认知理性”关系范畴的建构。这个建构无法满足“实践理性”的价值选择，解释什么是“值得的”。而“关系”的性质对于实践理性的意义而言是毋庸置疑的。

基于科学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本质的联系，并强调这些联系是可知的。这个命题如果不是想当然的话，至少它应该被限制在具有一贯性和同一性的可观察物理世界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普及于一切价值发生之处。这涉及到是用机械主义观念还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的立场来看待关系的问题。

“关系”世界的逻辑发生规律与“物理”世界的逻辑发生规律，有着覆盖范围和逻辑形式上的众多差别：物理世界的逻辑是基于一贯性和同一性原则，所谓“可证伪”的科学定义原则，就是指“是”与“非”不能同时成立，因而具有唯一性。但是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所谓“本质的联系”的提法本身很难成立，因为“本质”这个词并没有确实的所指。关系没有形态但是可以发挥作用，除了物理意义上的一些稳定的现象关系之抽象表达之外，在现实中事物的关系并没有什么被规定了的本质。这是关系形态之“无”和关系作用之“有”的一种普遍的结合形式；事物的运动导致关系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关系是不可存储的，这是关系特质“亦有亦无”的一种经验表达；在实践中因为变化的关系可能被利用也可能不被利用，如果不利用那么可能过去就没有了，所以称“非有”，如果利用那么就不能说它不存在，所以又是“非无”，这又是“非有和非无”的一种关系认知。又因为关系没有形态，却又可以被创造，可以被加强和削弱，而价值就发生在其中，那么考虑其中的种种联系也许就不是像休谟所说的那样“徒劳无益”的了。但是康德最终没有在关系这个范畴上获得更深入的进展，真正的原因在于西方哲学体系的基因里，没有产生过时间和空间相互结合的理论模式。

变化中的“关系”与“时机”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实践理性必须是时间与空间相互结合理性，价值选择与判断在时空结合关系方面有着明显的特征。所以“关系”这个范畴，从它的表达范围和逻辑作用领域来看，它的意义是高于认知理性的。对于它的认识，是更高层面的哲学。

4. 中国哲学的“关系”视野及其形式辩证逻辑

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一种经历几千年不曾间断的文明，应该是与其哲学层面的高度及其作用之深广有极大的关系，这种哲学所生成的文化最终融化了所有各种不同的入侵种族，并至今和平相处于同一片土地上。中国哲学的源头始于被中国文化奉为众经之首的《周易》，它的出现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末期。周易以极简的阴阳符号表达，贯穿世间一切物像及其关系的安排，为莱布尼茨（1646-1716）所惊叹。虽然它的精密推理并非

能够轻易为人掌握，但是用以进行关系判断和选择的基本原则，作为《周易》价值判断的精华，非常值得引起多种学科的重视。

反思康德哲学探索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如何将范畴应用于事实之中。事实是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事实，是人的欲望与无情的客观世界共存的事实。离开时间因素的参与，将范畴应用于事实必定遭遇巨大的困难。结果他一生的工作只成就于认知理性，而对实践理性的价值判断与道德逻辑，实际上是没有逻辑通道的。他的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根本原因恐怕是在于此路不通。

《周易》对世界表达图像的构建，其方法论的出发点具有宏阔的时空完备性特质。天与地、阳与阴，作为范畴是可以涵盖世界现象的，里面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中国先贤诠释周易的哲学特质，涵盖了简易、变易和不易三个方面。其中的“简易”，我们可以从0、1计数的表达模式来诠释，由此0、1原理建立的计算机及信息系统的表达能力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体验；“变易”可以用各种0、1符号组合的周期序列及时空结合模式来诠释，这部分发展出了中医学、人居风水学、预测学、兵法与战争学等众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术；而“不易”则可以用周易的价值判断与观察原则来诠释。

什么是周易的价值判断与观察原则呢？如果我们翻开《周易》，会发现这个原则被写在乾坤（天地）总纲的最前面：乾，元亨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元亨利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这里有两个重点需要关注。其一是建立这个哲学框架时，创立者的观察视角同时包括了自然和人（天地君子），并没有把人和自然打成两截，这意味着他的视角有着更加广阔的涵摄力。其二中国古人所传承的文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一种崇上爱下，承前启后的文化承担精神。不论是《周易》、《大学》、还是《道德经》，先贤一定吧所体悟到的最高原则写在最前面，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在价值选择和文化实践方面内在统一的行事原则。这个传统从《周易》的传承已经开始了。“元亨利贞”四个字，在被用于《周易》卦象内容观察时，是贯穿周易所显示的所有卦象内容的判断词。因为《周易》的内容包含了从人伦到自然的所有各个方面。从这四个字贯穿一切的法上来看，元亨利贞就是《周易》的创始者周文王所采用的观察“范畴”。这一组范畴的意义在文化研究历史上长久被学者关注并被认为是最为费解的一组词语。

《周易》之《文言》曾经对这组范畴的意思，从伦理的视角进行了诠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可以看出，这个诠释是针对伦理解释层面，理论上没有达到《周易》哲学体系之范畴的涵盖力实际应有的适应面，具有面向人伦体系的特殊性。此外《文言》的解释对这四个字的意义之措辞明显具有一定的褒义，作为哲学范畴在原理层面的概念解释，一旦加入了人类的感性的因素，便已经偏离了认知所需要秉持的中道立场。后来的学者以此之说为主臬，对于周易这套哲学范畴的认识难免导致对于《周易》哲学体系全局认知的困难。对于这组范畴的偏于伦理立

场的褒义诠释，笔者认为这也是后世儒家学说在演变、异化的过程中缺乏自清门户之学理判断立场的原因。

孔子相信天，在天的概念里，还有来自自然的一份内容。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规律，就属于《周易》所表述的“乾”（天）的内容。“乾，元亨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部分的内容的范畴表达，需要较为严谨的

中道立场，而不宜以局部的感性好恶为取舍。其范畴表达需要是一套具有涵盖力的名词性的概念。鉴于这个需要，笔者对元亨利贞的含义在中文应用过程中所关涉的含义进行了归纳，总结之后形成元亨利贞范畴含义解释对照表：

表1 元亨利贞范畴含义解释对照表。

周易四德关系范畴	对应自然	对应现象	《文言》对周易四德的引义	对应事物特征	对应的事物概念	连接事实与价值的描述性特质
元	春	植物的发芽	善之长	初始的基本的非造作的整体的首要的完备的先天的	对应自然的事物关系空间。对应人伦的决策的出发点	空间维度特质
亨	夏	植物的生长	嘉之会	通达的可行的	对应自然的事物的存在条件。对应人伦欲求的可行性条件	条件维度特质
利	秋	植物的开花结果	义之和	和谐的适当的适切的	对应自然的本然和谐。对应人的认知和行为关系的适切性、恰当性、和谐性	关系维度特质
贞	冬	植物的落叶过冬	事之干	长久的坚固的不变的可持续的	对应自然事物的可持续性。对应认知的真实性和行为的可持续性	时间维度特质

《周易》的这个范畴是从超越于形态乃至质、量等有形质的概念而建立的范畴，是《周易》用以判断事物的四个核心范畴，在《周易》中被称为彖辞。彖字的结构是代表猛兽咬合之象形文字，有断的意思，取义为判断之词。从它们所含的判断意义来看，元亨利贞是价值关系的一种全息观察与表达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将上表的内容与康德的关系概念的比较，不难发现《周易》对“关系”范畴的建构不同于康德的先验范畴之“关系”的微妙差异，及其衍生出的推理、选择空间的重大差别。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成语，在这里的应用似乎十分恰当。

康德的四个范畴是构成认知的一个整体，认为关系必以“质”的存在基础而建立，“质”必存在于关系之中。康德构建关系范畴用了实体与偶性、因果关系、交互作用这三个方面来诠释关系这个概念。讲到实体，必存在与实体的多维相伴特征，以物质世界“质”的一贯性和同一性可以建立因果的逻辑关系，事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这些判断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基本立场。而康德的这些观点在中国哲学系统中也没有任何的违和与值得辩驳之处。但这些经验逻辑哲学的成果，实际仅仅存在于形而下的哲学层面。

中国哲学的关系范畴建构，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停留在仅仅认识器世间的静态的、形而下的层面。元亨利贞这四个表述关系的范畴，是对没有形态的“关系”的构成维度及其逻辑空间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虽然它们也来源于经验，但是已经远远超出了经验的表象而具有抽象性。虽然具有抽象性，但又非常具体地将时间和空间的结合模式，表述为一个能够与事实相应而内在自洽的形式化的辩证逻辑结构。这个辩证逻辑体系的时空结合模式和推理模式，形成了对精妙复杂的价值抉择空间进行观察的基本范畴和方法论基础，是康德在范畴构建时毕其一生未能触及的。作为简化的表达，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及其推理观察的建构，我们可以从下面价值关系观察表的概念组合中一窥端倪。

表2 价值关系观察表。

范畴	季节	方向	阶段	关系性质	典型价值判断观察
元	春	东	初始阶段	关系空间范围、关系出发点、先天性、必然性	可行性范围、适当性范围、可持续性范围，整体性水平
亨	夏	南	成长阶段	关系可行性特质	可行性的整体性，可行性的适当性，可行性的可持续性，可行性条件
利	秋	西	衰落阶段	关系适当性特质	适当性水平，适当性范围，适当性的可持续性，适当性的可行性
贞	冬	北	消亡阶段	关系可持续性特质	可持续性的可行性，可持续性条件，可持续性的范围，可持续性

元亨利贞作为关系的一种结构性表述，与康德纯粹理性判断四个范畴的先天整体性有同样不可回避的先天性特质。关系的四个维度缺一，便不存在这种关系。这四个维度的组合及其整体性原则，贯穿了从自然界到人类活动世界的一切关系，是将物理世界与人伦世界收摄在同一哲学框架之下的理论体系。对于自然界被称之为规律的的关系，与中国文化中的“道”相呼应，对于道法自然的关系，元亨利贞描述了这类关系的完备性特质，即四德完具。规律具有其关系特质的遍在性、可行性、适当性、可持续性的完备组合。对于非自然的人类活动，它提出了人类自由发生空间以及价值创造的关系空间之

所在，并指出了全德之道的发展方向，止于至善是对于四种价值范畴完备性的追求。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元亨利贞所构建的价值形式辩证逻辑体系，完全不同于黑格尔初级的辩证法那种近乎诡辩的特质，它是价值定位系统和因果推理系统，是破除价值相对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的有效理论工具。康德哲学体系的因果关系空间，逻辑上只包含具有一贯性和同一性的认知理性的因果，对于人伦关系的因果逻辑缺乏解释力。元亨利贞所构成的形式辩证逻辑不仅能够接纳康德认知理性层面的因果逻辑，也包含了人类活动复杂多变、指向未来的实践理性的因果逻辑。

将自然与人类活动接纳为体的这个逻辑建构，它不仅能够对各种理论与现象的价值予以判断和定位，也能够诠释价值发现、价值维护、价值创造的实践路径。可以用于解释中华文明中天人一体、知行合一的基本逻辑与合理性，也能够诠释止于至善的实践方向的抉择。

5. 《周易》价值形式辩证逻辑之现代学术意义的研究

《周易》哲学体系的涵盖能力、逻辑特点及其哲学思维的学理高度，足以使它产生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虽然历史上这种哲学的陈述并没有怎么清晰化，但是中国文化的基调产生于这种哲学基因，中国文化历史的延延不断和无数精彩历史创造已经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素材和事实印证。至于这一哲学对于现代人类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空间，也十分值得我们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目前的学术界是科学实证主义哲学偏极独大的一个局面，而价值哲学、道德哲学作为人类学术具有方向引领作用的学科却被边缘化。或许随着中国哲学成为显学能够对此带来一些改变。

5.1. 对人类现象诠释学理论发展的意义

目前的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缺少价值判断的哲学理论，虽然理论百出而形成了管理学、经济学理论丛林，但是真正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还比较稀少。因为在效用、价值领域的概念模糊，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其学术关注点往往多偏向于可衡量的资本增益。而发展观念方面，东西方发展路线的差异引发了持久的争议。西方经济发展一度成功于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而中国模式在西方观念的连续唱衰下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被视作一个谜团。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在追逐资本的过程中，因资本的逐利行为导致国家基础产业的空心化而出现逐渐衰落的迹象。这些现象说明在经济、管理领域正需要一种更为具有全局观而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价值识别眼光，这种眼光显然不属于现在盛行于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作为认知理性在逻辑上没有承担未来价值选择的逻辑基础，而价值内涵，实际上又是人类管理行为和经济行为的实际主导。当经济学与管理学引入价值形式辩证逻辑，很多目前似乎难以解释的现象的观察，不难获得一种更加具有全局观而不被局部现象所迷惑的视角。

笔者在管理学领域的教学过程中曾经考问经历过高等院校科学教育的研究生们：“大家学了这么多年的自然科学、了解了这么多科学规律，能不能避免违反自然规律？”这其实是个被设计的问题陷阱，令很多的学生不自觉地陷入其中。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在这个陷阱中从来就不曾出来过。一些学生对这个问题不敢正面回答，另有一些很谦虚地认为不能避免。而实际上的答案是，所谓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能被违背的，如果出现一个某项“关于规律的命题”能够被违背的案例，这项关于规律的命题就是伪命题。简单地讲，能够被违背的规律本身不能叫做规律。从这个意义来讲，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违

背任何一条自然规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曾经违背过任何一条自然规律，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这件事情上一样人人平等。于是，下一个真正需要我们关心的问题出现了：既然没有人曾经违背过自然规律，那么人类的差异境遇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为此做哪些改变？它的根据和逻辑体系是怎样的？经济学和管理学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这类问题，中国哲学的价值形式辩证逻辑，将是这类问题的哲学基础。笔者曾提议将价值形式辩证逻辑方法作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在此也非常建议思考这个提议。

5.2. 对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发展实际上更多地参考了西方的发展经验和哲学理论。而追溯西方哲学史不难发现，经济学丛林、管理学丛林实际上产生于西方哲学史中混乱的价值观念。王玉樑先生曾经用几十年的时间收集西方哲学的价值观念，最终以混乱一词对其进行了总结[18]。价值追求是管理和管理学真正的核心，而至今为止由于这方面理论进展的缺乏，使得管理学至今没有自身的学科基础。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学作为学科的成熟过程，其阶段还处于幼稚期。

管理学在很多场合被称为管理科学，在方法论上更多地采用了狭隘的物理学所采用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是管理学课在其幼稚期寻求路径依赖的现实需要，但也是管理学发展的一种歧途，因为这样的管理学没有价值担当。笔者对于目前的管理科学有一个谑称，称为“不识好歹的管理学”。管理的真正本质在于价值追求，管理学本质应该是关于人类生存世界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安排的学术，这样一个管理学的定义，只有在价值范畴、价值认知、判断的方法论取得理论奠基以后才可能被提出，也许现在已经是一个适当的时机。

目前的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被现实的实践者远远地抛在后面。一方面管理领域的实践者对于管理学丛林的各种研究不屑一顾，另一方面管理学理论研究者对于实践的价值抉择不仅难以预见，甚至不能解释接纳一些被视为成功者的管理实践者的抉择。比如李嘉诚和马云都非常地重视风水，这在以科学为主导的一些学者眼中是一种“迷信”，而实际上这个学术领域是科学哲学的逻辑体系无力承载的，属于人与自然之间动态价值关系的选择问题领域，在中国哲学的价值形式辩证逻辑中有成完整体系的解释路径。德鲁克认为管理学是类似医学的一门学科，不属于物理学所言的科学，是具有实践理性立场的。中国的中医学也来自同一哲学背景，近代以来也面临被狭隘科学视野的“科学观”所打压，已经到了非常令人惋惜的危机境地。到底迷惑在谁那里可以暂且不谈，人类管理行为实际需要的价值逻辑，或许能够为人类价值选择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洞察力。

5.3.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意义

价值判断是道路选择的根本问题。曾经作为中国学习对象的西方价值体系目前正在经历动荡，一些对人类健康稳定的文化传统正在被逐渐抛弃。同性恋、毒品合

法化被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视为社会进步的象征。而需要自由以之为背景的价值理性，却没有得到过令人信服的解释。价值判断和选择原则的混乱见解，正是西方社会经历严峻动荡的实际理论背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下，中国的发展因为走了具有中国的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渐走向稳定健康的发展状态，中国人对于国家发展的满意率不断提升，对中国的未来也充满信心。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着经历千年不朽的道德理性的基因，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终究有一种自省的力量去不断地趋近于行为的价值理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目前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动荡局势，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这种理念实际上可以从中国价值辩证逻辑的基本建构中看到其来源。中华文明从其价值逻辑的基本建构中，就可以得到对于未来理想及其实现道路的选择之逻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开篇，就点出了价值判断作为一切学问之根本的首要原则。而平天下的目的和手段，都以明明德于天下为基本原则。这是一种来源于对道德原理认知以及面向至善实践理性追求的哲学归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道路之选择，也许都值得参考中国哲学的价值形式辩证逻辑。

中国哲学的价值形式辩证逻辑所展开的，是一种对于价值选择和路径选择之自由存在于其间的关系认识空间。元亨利贞分别代表了价值创造的不同范畴侧面，它的实践理性空间远远超越了资本中心的价值哲学。在这个原理性的关系空间结构中，存在着手段和结果之关联性判断的逻辑通道。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虽然体会到手段与结果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建议用良性的手段去取得良性的结果，但是因为对于善之为善的基本解释力的缺乏，他的建议是通过不断地行动去试错，这对于人类而言代价也是高昂的。中国文化中的价值形式辩证逻辑提出了关于行动的实践理性及其因果连接的判断途径，它有可能引领人类实现道德哲学与经济学的最终合一，从而进入一个更好的时代。

5.4. 对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建设与文化沟通的意义

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因为源流不同、习俗不同和文化表达不同，互相的理解会存在一定的障碍，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深而坚固的误解。举例来说，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家，只有一些与哲学相关的思想，这恐怕是文化理解方面的障碍所造成的。这种障碍首先在于不同文化的概念体系除了相似性以外，还有很多彼此语言概念不能够相互对应的地方，尤其是在超越于具体形态的意识领域，这种沟通其实困难极大。耶稣曾经对信徒说“一个义人也没有。”这条来自基督教的人性论断，后来成为西方世界能够将权力关进笼子的一个重要文化背景，现在来看对西方文明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翻译到中文当中，这句话可能会受到某些中华文化信仰者的反对。中华文明传统不仅有对最高道德的持久信仰和守护，而且对道德逻辑、道德层次的明确识别。尽管不能做到至善，至少还有反省改过之道作为弥补，认为向善的良知才是人的本性。中国文化曾经有过历时

千年的领先，这种内省的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中华文化中“义”这个字的层面，在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个序列中，排在第四位，那么它是耶稣当年所说的那个意思么？还是因为耶稣当时面对的信徒的见解能力只到这个层面呢？耶稣当年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因为怕信徒不能理解，在《圣经》中倒是确有记载。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解，恐怕不是能够用单词对应的方法轻易解决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研究认为人类的问题都是来源于语言理解的错乱，这在不同文化的沟通领域显得尤为明显。虽然到了最后，维特根斯坦认为彻底解决语言理解的错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从价值逻辑层面进行深入的语言与现象的联系解构，那么促进人类在价值文化方面的深入沟通，增进不同宗教背景的文化共识与和平往来应该是完全存在可能的。

价值概念因为与人类的抉择息息相关，所以又和道德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周易》的判断原则“元亨利贞”被称为四德。从认知理性立场它包含了事物的先天性质和动态特征，而在实践理性立场它又是推动事物成就的条件与推动力的观察维度。它包含了自然与人伦活动的全部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文化的道德二字，与西方文化的moral有很大的区别，因为moral所指的主要来源于对习俗的称谓。中国文化的道德二字，实际上包含了物质世界和人类心灵世界的全部内容，并有着贯通于各个学科的因果逻辑的理论范畴，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哲学的内在合理性导致了中华民族的久盛不衰，以及外来各种文化的不断融入而终究无违。

出于不同源流而产生的不同价值观念，如果不以具有人类以及自然共通性的逻辑思维通道进行沟通，可能出现的错解和误判多不胜数，真正达成相互之间了解与信任的程度会大打折扣。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具有人类共通性的逻辑面前，相互的沟通成功率会大有提高。对于价值逻辑而言，虽然在理论认知上比经验逻辑有所复杂，但人们都不难在生活实践中体会到它。以此为基础的沟通与交流，不仅会令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拥有丰富的建设性交往渠道，也存在对人类和平共荣可能路径探索的意义。

6. 结论

中国哲学是道德哲学，这“道德”二字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的组合形态，在世界文明史上可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从爱智慧的立场来看，中国哲学达到的本质层面不仅能够接纳包含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同时也包含了西方哲学家群体思所未及的实践理性之时空结合模式及其产生的价值推理。在人类文明史的早期，中华文明已经有了将真善美结合为一体的思维模式以及逻辑建构，它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各种创造。从哲学层面来看，中国哲学与形成于西方的哲学确实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学理高度，它的不被理解也许是因为思维模式和哲学层面之不同所致。这种不理解不仅存在于西方，实际也存在于东方包括接受西化教育的大批中国人的人

群。明朝末年的憨山德清禅师给“德”字下了一个定义，“德者成物之功也。”这个定义以笔者的眼光看，实在值得再三推介。它不仅仅包含了对于客观事物的承认与接纳，具有客观和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包含了人类的自由与理想的发生空间。中国哲学既然是这样一种哲学，有它自己的名称体系和独有视野，那么跟在西方哲学之后称为“哲学”似乎也不是非常恰当，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为“德学”。这样既能够反映中华文明的独特，对于智慧之学而言，也是一个亦旧亦新的不同学科体系。它将可能引导人类重新定义管理学、医学、经济学等很多学科的内涵，把人类带入更具有幸福感的时代。

参考文献

- [1] 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瞿铁鹏、殷晓蓉、王鉴平、俞吾金译，上海人名出版社，2017年1月。
- [2] 程少川：东西方价值哲学比较视域下的中华文化优势特质新探，《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3] 邓晓芒：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自由范畴表解读，《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
- [4] 方克立：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人文杂志》，2005年第4期。
- [5] 弗里德里西·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 [6] 侯钧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社会学研究，1995（3）：3。
- [7] 胡伟希：中国哲学“合法性”思维态势与类型——兼论中西哲学类型，《现代哲学》，2004年第3期。
- [8] 金景芳：《周易通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
- [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1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1] 老子：《道德经》。
- [12] 李磊：休谟怀疑论哲学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 [13] 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图宾根，1968年。
- [14] 明·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憨山大师全集》。
- [15]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 [16] 《圣经》。
- [17] 田丰：王船山“四德”天人之辨的人性论意义，《船山学刊》，2016年第5期。
- [18] 王玉樑：关于价值本质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
- [19] 王玉樑：当代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困境，《西部学刊》，2015年第2期。
- [20] 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 [21] 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北京，2005年版。
- [22] 庄振华，黑格尔辩证法探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9月。